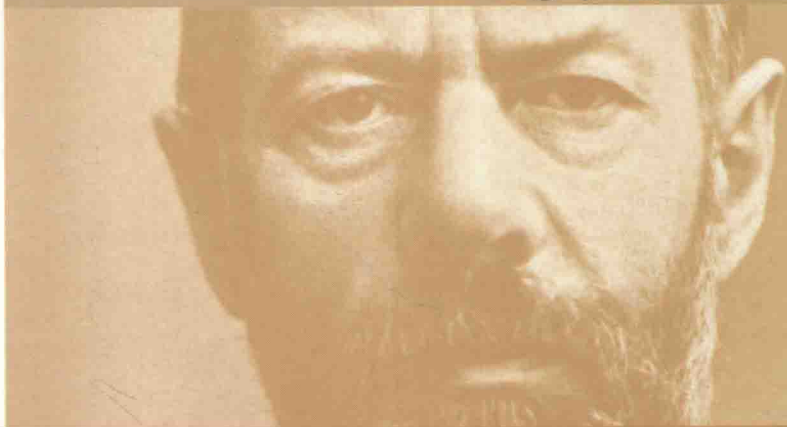




马克斯·韦伯与 中国社会科学

◎ 李永晶 著



Makesi Weibo yu Zhongguo Shehui Ke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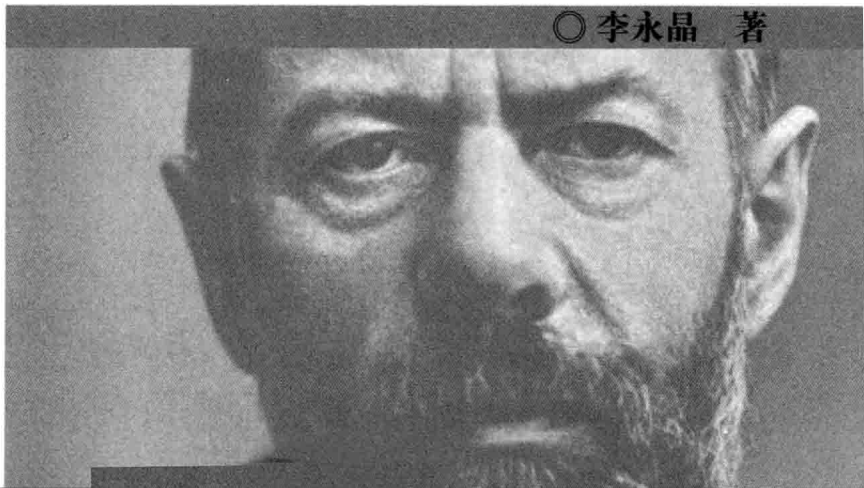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

◎ 李永晶 著



Makesi Weibo yu Zhongguo Shehui Kexue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李永晶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6

(华东师大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7-5675-3725-5

I. ①马… II. ①李… III. ①韦伯, M. (1864~1920)—哲学思想—研究 ②社会科学—研究—中国 IV. ①B516.59 ②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5508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

著 者 李永晶
项目编辑 夏 玮
责任编辑 阮光页
审读编辑 马丽群
封面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725-5/G·8397
定 价 4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第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

绪论 马克斯·韦伯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3

-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课题 3
 -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5
 - 三 研究构成与主要内容 9
-

第一章 中国韦伯研究史与研究资料概述 11

- 一 中国韦伯研究史及其问题意识 11
 - 二 国外韦伯研究翻译中的“韦伯形象” 21
 - 三 中国韦伯研究的问题点 25
-

第二章 “马克思与韦伯”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 观念的变革 27

- 一 引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科学 27
- 二 中国社会科学性格与品格 28
- 三 “马克思与韦伯”问题研究史概观 31
- 四 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与韦伯”问题研究 37
- 五 结语：“马克思与韦伯”问题再考 44

[附论]

作为方法的“价值中立”: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46
一 世界观、方法论与实践的关系再考	46
二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接受状况	48
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韦伯方法论的批判	50
四 知性的诚实与学者的成熟	52

第三章 中国语境中的韦伯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55

一 引言:韦伯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	55
二 韦伯的政治哲学: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视角	60
三 中国韦伯研究中的韦伯“政治哲学”	67
四 结语:理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72

[附论 1]

重新理解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74
一 施特劳斯学派的韦伯批判与古典政治哲学	74
二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对立”	76
三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与古典政治哲学	80

[附论 2]

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	81
一 施特劳斯与中国政治哲学热	81
二 施特劳斯的自然权观念:自然与道德的回归	84
三 施特劳斯与中国政治哲学的转型	87
四 作为哲学的社会科学	89

第四章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 92

一 引言: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官僚制研究	92
二 中国“政治成熟”话语的现状与陷阱	95
三 韦伯的政治观念与“政治成熟”的三重结构	98
四 韦伯视角下古典中国的政治特征	107
五 结语:政治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111

第二部分 比较的视点:马克斯·韦伯在日本

第五章 日本的韦伯研究史与日本社会科学的建构 115

- 一 引言:韦伯研究与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 115
 - 二 战前日本的韦伯研究:韦伯、马克思与社会科学 117
 - 三 战后日本韦伯研究(前期):“韦伯与马克思”问题与
现代化理论 121
 - 四 战后日本韦伯研究(后期):现代化之后的社会科学 125
 - 五 结语:思考社会科学的存在样式 131
-

第六章 知性的诚实:日本韦伯论争与日本的社会科学 133

- 一 引言:日本韦伯论争与学者“知性的诚实” 134
 - 二 日本韦伯论争的经纬与主要当事者 136
 - 三 日本韦伯论争中关于《伦理》论文的主要观点 139
 - 四 日本韦伯论争与“知性的诚实”的结构 145
 - 五 结语:日本韦伯论争与社会科学的根本性格 150
-

第三部分 比较的视点:马克斯·韦伯在俄国

第七章 苏联解体的科学分析: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角 156

- 一 问题:何谓“苏联解体”? 156
- 二 韦伯的“俄国革命论”:预言未来 158
- 三 俄国历史的必由路径:官僚制、民主制与人性 162
- 四 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的视点 168

五 结语：韦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距离	170
结论 马克斯·韦伯体验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	172
一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结构	173
二 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格与品格	174
三 再论中国学者的韦伯体验意义	175
附录 [1]	
知识社会学方法论	
——知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话语分析	178
附录 [2]	
韦伯研究年谱	196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3

第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

从现象上看,对于今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而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名字早已不再陌生。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发现这种对韦伯及其学说的熟识历史并不长久: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与学说可以说是随着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被引入中国的一种“人类文明成果”。那么,为什么韦伯会得到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的中国学人的关注?韦伯“来到”中国后,经过了怎样的具体历程?这位以“社会科学家”为其重要身份标识的学者,他的社会科学观念得到了怎样的对待?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学人从韦伯其人及其学说中,获得了知识、思想与人格上怎样的滋养与熏陶,从而吸收了“韦伯”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以真正的知识而非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笔者将从若干侧面刻画韦伯在中国的经历,目的在于实证性地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了怎样的进步?依然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显然,本书无法全面回答这一虽然重要但涉及广泛的问题。本研究的主旨仅限于,基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学者的韦伯研究与韦伯体验进行描述与分析,从特定的经验角度给出一个具体的回答。

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者一样,马克斯·韦伯其人及其学术属于世界,属于世界文明。中国学人对待这种特殊文明的态度,彰显着我们与世界文明的距离。

绪 论

马克斯·韦伯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课题

本书的研究课题属于“中国社会科学建构”问题实证研究的一部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中国学者已经从多方面加以描述和分析;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邓正来自 1990 年代前期开始的一系列“研究与反思”活动,将“中国社会科学”自身建构为一个学术问题与学术研究对象。这一点表现在他提出的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缺失自主性?”“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社会科学的后尘?”^①为数不少的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作为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或者说结论,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被认为是生成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全球化的构造等因素的相互关联当中。

然而,这种宏观的、大尺度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我们不应忽视的是,这种理论上的总结与其说是“结论”、解释了问题,毋宁说进一步引发出了新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得到建构的?稍微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等要素,究竟在怎样的社会过程中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

^①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2 页。

品格？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若被视为可欲的价值，那么这种自主性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自主性”吗？这种发问终于将我们引向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克制我们继续质疑的欲望，因为在知识上富有生产的行为不是这种无限的追问与玄思，而是更为基础性的分析工作。——这正是本研究的立场与出发点。只有通过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我们才能将对象，即“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出来，才能对对象的问题点与历史性格加以比较精确的确定与定位。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暂定为以社会学、政治学为核心的狭义上的社会科学。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研究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界认识、接受马克思·韦伯及其学说的历史过程为素材，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领域，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的韦伯，中国社会科学界在接受其学说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换言之，“韦伯学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翻译、生产与再生产、消费、流通的过程中，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得到了怎样的重塑？毫无疑问，从最终的结论上并且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来说，上述过程应该是一种“权力/真理/知识”复合体变容的历史，因而是一种充满了斗争与妥协、解放与压抑的历史。——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将这一历史重新呈现出来，这正是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标。

要言之，本研究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在韦伯研究这一层面上的建构过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迄今为止并未从实证层面关注这一问题。作为例外，在中国的韦伯研究领域有开先河之功的苏国勋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了中国韦伯研究的一些状况。然而，他只是极其简单地谈及了韦伯部分作品的翻译以及1980年代“韦伯热”的背景，比如“责任伦理”与改革的契合、周边国家韦伯研究的影响等等，因为他的主题是对新儒家牟宗三的东西文化论与韦伯的相关论述进行对比。^① 对中国的韦伯研究进行细致的、基于文献的把握，并未进入该文作者的视野。

下面，我将依次简略阐述本课题的对象、研究方法与资料等问题。

^① 苏国勋：《马克思·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社会》，2007年第3期。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为何选择马克斯·韦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经历了一次大规模引介西方著名思想家与学者著作的热潮;尤其是在1980年代,各家各派的学术与思想纷纷在中国学界登场。那么,本研究具体选定“马克斯·韦伯”为分析素材的意图何在?或者依照上述问题意识来说,以中国学者接受韦伯的过程为事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问题,具有怎样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本研究的展开,这里暂时举出三个客观上的理由。

第一,韦伯在所谓的“西方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声誉,也一直在遭受质疑——注意“质疑”乃是西方社会科学的首要品格。这种韦伯认识同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如同韦伯论者注意到的一样,经过1980年代的“韦伯热”,“责任伦理”、“卡里斯玛”、“理性化”等说法已经逐渐进入媒体等社会领域。^①近年来,围绕这些概念的介绍与解释,更有大量的“论述”生产出来。在这种新近出现的以“韦伯”为中心的话语空间当中,作为上述各种极富原创性的概念、理论、方法的创始人,韦伯无疑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社会科学界带来了社会历史认识变化的契机。比如,在中国的部分论者当中,韦伯理论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等“主旋律”建立起了关系。^②这种做法是否得当这里暂且不论,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韦伯的理论被用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事实。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韦伯学说的“中国化”?这一看似简单的质疑,再次迫使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意识。

就此而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如何理解并接受韦伯学说,对本研究而言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具体分析韦伯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以及理论得到了怎样的翻译、解读乃至误读,并进而分析它们对中国社会科学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韦伯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社

^① 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② 比如,阳勇:《论韦伯“新教伦理”与“和谐社会”》,《船山学刊》,2006年第1期。应该说,这种类别的文章最富有“中国特色”。

会科学当中,“马克思—韦伯”对比研究乃是题中之义,认真的中国学者对此应该并不会感到陌生。这是因为,早在1980年代出版的英国学者麦克雷(D. G. MacRae)所著《韦伯》的中译本中,就有这样的介绍:英国和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最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讨论这样的命题:“韦伯的社会学乃是与卡尔·马克思的灵魂展开的一场辩论。”^①这一问题对于二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家而言更是如此。那么,中国的韦伯研究者或曰韦伯论者在怎样的程度上理解并探讨了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极为重要的韦伯研究领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是一个“试金石”——因为马克思主义曾被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流与底色,或曰,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正统社会科学,那么中国学者是否可以秉持公直的学术态度讨论这一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的韦伯研究当中,我们容易发现“马克思—韦伯”这一问题设定得到了相对特别的关注;其中,国外韦伯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激发中国学者亲自探讨韦伯学说的一种要因。比如,在中国学者撰写的一部《韦伯传》中,有如下表述:“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对其科学性的否定结论,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将马克思主义同脱离社会的非历史的结构功能主义相提并论,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不是先知,而是揭示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思想者,马克思主义正是其思想结晶的体现。”^②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对主流马克思主义观的简单重述,是一种宣言式的主张,而非基于严密的学术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韦伯—马克思的对比首先激发了中国部分学者护教论式的辩论热情。

本研究无意于在马克思与韦伯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任何严肃的思考都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项选择无关。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分析中国韦伯论者在阅读与研究韦伯的过程中,是否以及怎样重新阅读并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只能在上述过程中加以确定与认识。因此,如果这样表述本研究的对象规定,那么这项研究的具体成果及其意义就将取决于这个事实:中国学者在多大的意义上与韦伯进行了灵魂上的对话。我们只有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

第三,由于韦伯在其规模宏大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对中国的宗教与社会进行了讨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韦伯是一位“中国研究专家”。那么,韦伯的“中国研究”——以其《儒教与道教》为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中国学者对韦伯命题与分析方法是欣然接受,还是产生了自然的抗拒?

① 麦克雷:《韦伯》,孙乃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7页。

② 魏峰:《韦伯传·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页。

抑或,他们完全不为所动、无动于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亦取决于中国学者对文本的解读方法与水准。不论怎样,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关注了中国问题,这一现象自身就构成了中国学者关注韦伯学说的一种理由。^①

要而言之,在思想、学术与话语等诸层面上,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将以特定的方式对解读者、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实践者带来观念与认识上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对韦伯学说的阅读与理解将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

2. 资料对象——中国韦伯研究资料空间的建构

本研究具体讨论的资料对象为“中国的韦伯研究”。这里,“中国的韦伯研究”是一个宽泛的定义:中国学者对韦伯学说进行的任何方式的讨论都构成本文讨论的对象。之所以采用这一宽泛的定义,笔者有两点考虑。第一,一般而言,“韦伯研究”是指韦伯专家进行的严格的学术工作;然而,在现代中国,尚未出现这种严格意义上以解说、分析、重构、发展韦伯理论为学术事业的专门学者,因而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韦伯专家(学者)”与“韦伯研究”。考虑到这一研究现状,本文在原则上将所有中国学者撰写的“韦伯论”——即主旨涉及韦伯及其学说的各种论述——都视为对象资料。第二,由于本文关注韦伯其人、韦伯的概念体系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科学建构所起到的作用,本文必须将这种建构置于“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当中。上述宽泛意义上的“韦伯研究”,恰好构成了这种话语空间的物质基础,从而我们可以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当然,这是一种新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是在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后,将话语纳入知识生产体系的分析。^②

本研究具体分析的资料设定为以下四种:(1)韦伯著作的汉语翻译资料;(2)中国学者的韦伯研究与韦伯论;(3)关于国外韦伯研究的翻译资料;(4)西方思想或社会科学译作中有关韦伯的论述,比如马尔库塞、卢卡奇、哈贝马斯、帕森斯、施特劳斯等人的著作中的“韦伯论”。毋庸说,这些资料构成了一种广义的关于“韦伯”的资料空间,

①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中国学者有其对韦伯能将目光聚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而感到欣喜和兴奋,也对韦伯仅仅凭借间接材料就能对中国历史与社会有如此精到的见解而惊叹,韦伯研究的热情也因此而高涨。”参见魏峰:《韦伯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② 这是一种“新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关于这种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特征,请参阅本书附录所收论文。

这一资料空间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镶嵌于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的结构当中。因此,本研究将首先描绘出这一资料空间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进行主题分析。

3. 研究方法——话语分析与比较分析

如上文提到的一样,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本研究将主要采取作为“新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话语分析方法:通过整理、分析中国学者关于韦伯的各种言论,来解析中国学者接受韦伯学说过程中,在社会科学观念与方法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分析有益于揭示韦伯的概念与方法在微观上如何渗透、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社会认识过程,进而有助于本文主题、亦即对中国社会科学建构问题的探讨。

另一方面,为了从时空上确定本文主题的位置,本研究还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具体言之,笔者将以“日本的韦伯研究与日本社会科学的建构”为参照坐标,来确认中国学人在韦伯研究上的得与失。日本的韦伯研究最近数十年在国际学界也正在得到认知,日本学者被认为已然达到了可堪与欧美韦伯学者在多种层面上展开对话的水准。因此,通过参照日本的韦伯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具体侧面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将反过来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于何谓社会科学、何谓中国社会科学等问题进行反思,并激发我们主体性的建构热情。

同时,本研究也将从特定的角度关注韦伯与俄国(包括苏联时期)社会的关联,从而为本书主题提供另外一个比较的视角与参考框架。这一视角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中国与俄国曾有过类似的历史时期,共有过类似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因而也有过类似的社会科学建构与研究体验。考察韦伯学说在俄国社会的经历,更有益于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科学乃至中国社会自身的诸多问题。

4. 测量指标——如何从韦伯研究看中国社会科学建构

那么,如何基于上述分析最终对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相关问题做出回答?如上文所述,本研究具体通过韦伯其人及其学说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这样一个事件——即本文所言的“韦伯研究”,或者退一步说是中国学者的韦伯阅读体验——,来确认中国此前的“社会科学”得到了怎样的形变乃至重构。因此,如何测量这种形变与重构,就成为这里必须明示的问题。

在我们试图确定上述测量标准之时,我们发现首先有必要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

根本属性。具体论述将在本研究的正文中展开,这里仅仅要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属性取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论述与规定。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被视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制度的理论根据,持续地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全域发生着压倒性的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宏大的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刻画与通过权力体制的实践影响下得以建构而成。

正是在这种总体性的社会科学观念之下,我们有必要在战略上规定本文的测量指标,否则我们将无从把握这种总体性的观念的变化。依据上文阐述,本文具体设定下述三个指标:第一,在韦伯学说导入的过程中,本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下位范畴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定位,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宏观观念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问题。第三,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韦伯社会科学研究纲领及其概念体系对于中国学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方法意识上的问题。

在后面的正文中,本研究将通过对几个主题的分析,对上述三个指标进行经验性的刻画与描述,从而达成本研究的最终目的。

三 研究构成与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阐述,本研究分为三部分,具体设定的研究主题如下所示。

首先,第一章将对中国的韦伯研究史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刻画与描述。在时间上,本章将介绍中国韦伯的接受过程;在空间上,本章将具体指出中国学者接受的韦伯学说的具体内容与结构。本章将成为以下各章的基础。

在第二章中,本研究将具体分析“马克思与韦伯”问题在中国学者中得到了怎样的接受与解释。第三章将从中国最近十年备受瞩目的“政治哲学”的视点着手,分析中国学者在理解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得与失。第四章将聚焦韦伯几个具体的社会学文本,从一个微观层面看韦伯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理解与运用。上述内容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本书将基于比较的视点,选择日本学界韦伯研究的两个主题进行对比分析。第五章将从宏观上刻画日本的韦伯研究史及其问题意识,进而将其与日本的社会科学的存在样式建立起关联。第六章将具体刻画日本学界发生的一

场围绕韦伯研究的论争。通过这一具体事例,笔者将努力把日本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格——比如作为学者自律的“知性的诚实”——与日本的社会科学观念揭示出来。这两章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相对地把握中国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

最后,在第三部分,笔者将以韦伯对俄国社会的分析为事例,具体讨论韦伯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准确性与预测能力问题。显然,这种分析将在最大程度上凸显出韦伯社会科学与苏联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这种分析将把我们带入何谓社会科学的普遍问题上。

结论部分,笔者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并指出留存的问题,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与方向。